

《中華民國史》第二編第五卷。楊天石、牛大勇、習五一等編著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 年。808 頁。

一、新的資料和新的內容

《中華民國史》第二編第一、二卷的「北洋政府統治時期」(1912-1920)，早在 1989 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。第三、四卷尚未見到，而第五卷的「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」，則在 1996 年出版了。第一、二卷的主編為李新和李宗一；第五卷的主編為楊天石，李新為總編。一、二卷和第五卷的執筆人也完全不同。一、二卷的出版，筆者曾有評介。¹大致說來，各卷對史事的表達和分析，均有高度的技巧和水平，資料的運用至為豐碩，故其內容亦稱充實。

本卷重大特色之一，是採用了大量的檔案資料，這些資料不僅包括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方面的，還包括中共方面的；不僅包括中文的，還包括英、俄、日文的。更重要的，還有一些當事人的「個人」資料，如《蔣介石個人全宗》、《蔣介石收各方電稿、抄本》、《蔣介石日記類抄》、《馮玉祥個人全宗》、《吳稚暉個人全卷》、《張靜江個人全卷》等。大多是由本書首次引用，其價值之高，可以想見。

要使著作有創新的內容，就必須充分利用新的資料。人云亦云，陳詞濫調，徒使讀者乏味。而本書在新資料方面的利用，確居優勢。例如蔣介石之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經過，常見的資料，是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一書所述，謂「張（靜江）、譚（延闓）勸公（蔣）任北伐總司令，力辭；轉推譚，譚不允，各軍長又交迫之」。此說似嫌「公式化」。但著者

¹ 刊於國史館編印，《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》（台北：國史館，民國 79 年 4 月），輯 5，頁 37-54。

引用《蔣介石日記類抄》所記，不但有真實感，且有新穎之處，說 1926 年 6 月 3 日，蔣介石與張靜江、譚延闓商量總司令人選問題，張、蔣二人推譚，譚自然不肯應允。蔣介石再與鮑羅廷商量，鮑力勸蔣介石「勉擔艱巨」，並稱：如蔣不出任，他將辭去總顧問一職。鮑為何力勸蔣「勉擔艱巨」？著者引用俄顧問斯切潘諾夫的報告指出：中山艦事件之後，蘇聯軍事顧問團即決定滿足蔣介石追求個人「尊榮」的欲望，協助他取得「比較現實更為偉大之權力與實力」。其具體位置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。（頁 18-19）鮑之此舉，非僅「順水推舟」，亦是基於「利用」的需要。利用蔣的影響和力量，來抑制「右派」的勢力和活動。蔣對此也有相當的回應，如吳鐵城之被拘，伍朝樞之被逐，即其事例。可見蔣、鮑兩人之間的關係，尚有彼此相需之處。在北伐開始以後，廣州內部一些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人員發動「迎汪」運動時，鮑和中共廣州區委並不積極贊同，而是採取聽其自然的消極態度。蔣在北伐前線，得知共黨在後方「搗亂」甚急，藉「迎汪」以「倒蔣」，頗為「切齒」。（頁 127）似乎與鮑無關。過去「反共」之論，常把鮑與中共視為「一個鼻孔出氣」，殊可議也。

二、引用資料不可馬虎

鮑羅廷與蔣介石之間關係的變化，實即標誌著蘇聯、中共和國民黨之間關係的變化。此一關鍵性的問題，從本書相關的記述中，可以清晰的看出來。例如為了遷都武漢之爭，鮑、蔣之間發生了一次正面的衝突。本書有如下之記述：

1 月 12 日（1927。按應為 1 月 11 日），蔣介石偕彭澤民、顧孟餘、何香凝以及加倫抵達武漢，與徐謙等人晤談，要求在鄂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遷贛。……武漢也仍堅持自己的立場。……當晚，在歡宴蔣介石時，鮑羅廷猶豫再三，終於說：革命之所以能迅速發展到武漢，「乃是因為孫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」。「第一是聯俄政策，第二是聯共政策，第三是農工政策」。他並說：「以後如果什麼事情都歸罪到 CP，欺壓 CP，妨礙農民工人的發展，那我（鮑自稱）可不答應

的」。第二天，鮑羅廷與蔣介石進行私人交談，並且寫了一封長信，和孫科一起交給蔣介石，提出遷都武漢的理由。蔣介石以為「很對」；但表示須一星期後回南昌並開中央政治會議討論。他對鮑羅廷昨日晚宴時的講話耿耿於懷，聲色俱厲地要鮑羅廷指明：「哪一個軍人是壓迫農工？哪一個領袖是摧殘黨權」？並說：現在「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是一個赤色的帝國主義者」。他指責鮑羅廷「跋扈橫行」；聲稱：「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，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，完全是你來破壞我們總理聯俄政策，就是你來破壞蘇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」。鮑羅廷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本來還過得去，自此，雙方就都難以相容了。（頁 140-141）

上段記述，頗為生動。資料來源，據註是根據蔣介石的《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的講演詞》，載於 1927 年 5 月 4 日的上海《民國日報》。但就筆者手頭現有的資料來查證，上段記述，並非完全出自蔣的《講演詞》。鮑所講的「三大政策」以及「歸罪 CP、欺壓 CP」，「他可不答應」等話，是見於李雲漢著《從容共到清黨》，所據資料是梁紹文的〈三大政策的來源〉，《進攻週刊》第二期，1927 年 5 月 14 日。²其次鮑與蔣之「私人交談」，蔣以為「很對」的話，見拙著《鮑羅廷與武漢政權》（頁 37），所據資料是 1927 年 1 月 15 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第十三次會議記錄中鮑羅廷的發言。³其三，蔣指責鮑的話，則是根據蔣的前項《講演詞》。李著《從容到清黨》亦有收錄。⁴該書把這幾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湊合在一起，未註據蔣的《講演詞》，這就顯得有些馬馬虎虎了。同時，對於鮑、蔣兩人的爭執，以及是非曲直問題，著者顯然認為蔣有不對之處，說「事實證明，蔣介石在武漢的允諾是虛假的。返贛途中，他在牯嶺與張靜江商量，提出驅逐鮑羅廷。」（頁 142）

蔣介石在武漢對鮑有無「允諾」？是須加以探討的。按鮑在 1 月 15 日武

² 李雲漢，《從容共到清黨》（台北：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，民國 55 年 5 月），頁 557、602。

³ 蔣永敬，《鮑羅廷與武漢政權》（台北：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，民國 52 年 12 月），頁 37、52。

⁴ 李雲漢，《從容共到清黨》，頁 536-537。

漢臨時聯席會議發言中，還說到蔣對他所提出的「理由」有所反駁，鮑對蔣的「反駁」，表示「贊同」，並認為「亦無不可」。這段發言記錄，該書略而未採，今補充之。鮑羅廷說：

當時我（鮑氏自稱，下同）的意見：現在時局嚴重，為節省時間起見，中央政治會議可否在武漢開會，請南昌同志到武漢來。蔣同志提出幾種理由，以為應在南昌開會，所費亦不過兩三天。當時我亦贊同，以為在南昌開會，亦無不可。⁵

三、北伐戰略與國共鬥爭

鮑羅廷及中共為了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，實以蔣介石為鬥爭的目標，其過程由「脅」而「反」而「倒」，詳細經過，筆者去年(1996)曾發表〈北伐期間「迎汪復職」問題〉一文以探討之。⁶鮑與中共的倒蔣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，但仍未能把蔣扳倒者，原因何在？該書認為：「因為蔣介石還掌握軍權」（頁 155）。這當然是重要的原因，但非唯一的原因。因為當時握有軍權而參與反蔣、倒蔣者，在北伐軍的將領中，除最具實力的唐生智外，還大有人在。即蔣之嫡系第一軍的三個師長中除劉峙忠於蔣氏外，其他兩位如薛岳、嚴重均傾向武漢中央，二、三、六軍也是站在武漢方面的，在武漢能征善戰的第四軍更不用說了。鮑且握有國民黨武漢中央，發號施令，可謂權傾一時，而終至不敵蔣氏者，顯非單純的軍權問題。如就該書所述相關史實中，不難理出一個有系統的多種原因，例如北伐戰略的選擇，對外關係的運用，民眾心理與社會傾向的掌握，友軍與軍閥歸順的趨向等，都是重要的原因。

僅就北伐戰略的選擇而言，如該書所云，北伐最初的戰略是各個擊破，集中力量首攻吳佩孚（兩湖及河南）。即「先定三湘，規復武漢，進而與我友軍國民軍會師」。唯當武漢尚未規復之前，蔣介石即於 8 月 29 日決定親自指揮江西戰事。9 月 2 日，命第二、三、六軍在三天後進攻江西。這一決策的改變原因，據著者的分析：一是孫傳芳的出師援贛；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；

⁵ 蔣永敬，《鮑羅廷與武漢政權》，頁 37。

⁶ 中華民國 85 年 6 月「北伐史事與史料學術研討會」論文。

三是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猜忌。而第三個原因則是爲了對付「倒蔣」，著者引蔣之《日記》云：「得粵電，知後方有迎汪之謀，……以爲倒蔣之伏線」。他覺得自己已經陷入「四面楚歌之境」，必須「奮鬥自強」。（頁 56-57）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戰鬥，終於擊敗孫傳芳。這一戰役的結果，「它使湘鄂得到屏障，同時打開了向長江下游進軍的大門」。（頁 67）

進軍長江下游，是北伐的「東進」戰略，是國、共之間一項關鍵性的戰略鬥爭。1927年1月1日至7日，蔣在南昌召開軍務善後會議，蔣提出向長江下游進軍問題，左派鄧演達認爲此舉是蔣介石「欲在東南別開局面的政治問題」，因此持反對的態度。俄顧問加倫也不贊同。但由於蔣的堅持，會議決定對河南暫取守勢，對浙江，江蘇、安徽的孫傳芳取攻勢。決定北伐軍分編爲東、中、西三路的作戰序列。（頁 195-196）

中共對於蔣之「東進戰略」有嚴重的威脅感，羅亦農在上海說：「北伐軍一來，江浙兩省必有絕大的反赤局面」；現在如果公開「倒蔣，蔣必益發反對 CP」。爲今之計，借助於北伐軍進軍上海的聲勢，發動大規模的武裝起義，推翻「軍閥」（似對蔣）統治，建立市民政權。（頁 208）

北伐軍於3月21日及24日，分別進佔上海和南京。中共亦依既定計劃發動了上海「第三次起義」和建立了上海市民政權。此舉不但無法阻止「反赤局面」，反而引起更大的「反赤局面」。這是因爲「東進戰略」之成功，不僅使蔣介石解決了財政的困境，改變了馮、閻友軍的趨向，擺脫了俄人、中共及左派的糾纏。此外，更有本錢來搞對外關係了。就是該書第三章標題所說的「列強分化中國革命與蔣介石發動政變」。也可以反過來說：「蔣介石利用列強分化中國革命發動政變」。

四、內亂外患互爲因果

本書第三章「列強分化中國革命與蔣介石政變」，在標題用詞上雖具有主觀性的價值判斷，但其充分利用中、美、英、日各方面的文件和檔案資料，使得本書的內容大爲出色。

北伐前後，廣州內部情況以及國、共之間關係的變化，實爲英、美、日

等國當局極為關切的問題。著者根據這些國家的外交文書或檔案資料，對於這些國家駐華人員及其政府當局的反應，作出極為精彩的引述和分析。講到列強「對南方國民革命陣營的窺測」時，著者綜合引論如下：

國共合作以後，列強根據國民黨人對反帝和聯共的不同態度，將他們大致劃分為左、右兩派，通常稱前者為「激進派」或「極端派」，後者為「溫和派」或「穩健派」。列強認為國共合作的基礎是民族主義，而不是社會主義，國民黨與蘇俄結盟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聯姻，因而國民革命陣營存在著裂痕。（頁 267）

比較英、美對廣州情況判斷的準確性而言，著者認為：

從中山艦事件至北伐前夕，美國當局對蔣介石的基本立場和兩面策略，判斷大體準確，情報比較靈通。而英國當局則感到對革命營壘的情況若明若暗，蔣介石的真正面目時隱時顯。（頁 269）

至於日本方面，似乎比美國的判斷還要準確。它在中山艦事件之前，其外務省已看出國民黨「溫和派」將來有可能支配全中國，特意告誡陸軍省約束土肥原賢二等人勾結北洋軍閥的活動：「帝國軍人無論如何不可有同我對華不干涉政策背道而馳的舉動」。（頁 267）

從著者所引述的大量外國資料中，也可顯出一種趨勢，即南方由不受列強重視的地位而走向強大與向外發展以後，內部雖有矛盾但未出現分裂的局面時，列強雖企圖分化，但卻有所顧忌，常會作出對南方讓步或示好的舉動；同時為怕開罪南方，對北洋軍閥的要求援助，予以拒絕。但當南方內部出現分裂時，列強態度也就隨著改變，不但助長分裂，更要乘機從中漁利。這種現象，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。所謂因內鬥而召致外侮，內亂必生外患者，乃中國人一貫的悲哀。如謂「列強分化」而致蔣「發動政變」，那也不夠全面；「勇於內鬥」「人侮自侮」，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。我們通常提到帝國主義的野心時，還缺少自我反省的胸懷。

五、過度曲護有礙真象

北伐期間，國、共兩黨都在爭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。國民黨方面則恃軍權；共黨方面則恃黨權與農工運動。前者視農工運動為「暴亂」、「破壞」；後者則視軍權為「獨裁」，以農工運動為「革命」，國民黨左派初附和之，右派則反對之，故右派被標為「反革命」或「反動派」。當左派轉右時，則被指為「叛變」。這些用詞，都是用於政治鬥爭的，不足為訓。學術性的著作，應避免使用之；縱非使用不可，則應以括號引用原文為限。而本書在用詞方面，有時充滿政治鬥爭的意味。

北伐時期兩湖地區農工運動的「過火」，引起當地軍民的反抗，這是事實。但如何鑑定可信的資料，說明其真象，分析其原因，明其得失利弊，作為鑑往知來的參考，此為治史者的基本職責。如果以此要求標準，來衡量本書對農工運動問題的處理，則不免有些失望。例如講到長沙的許克祥「馬日事變」時，該書的描述是：

明明是許克祥等猖狂進攻，屠殺革命人民。但是，在湖南省政府的電報中，卻成了糾察隊進攻軍隊。顛倒黑白，一至於此！（頁 557）

許克祥發動叛亂時，靠的是武力。（頁 558）

汪精衛的武漢分共，該書的形容是：「汪精衛集團確定分共政策之後，反動軍官、土豪劣紳們大為活躍」。對於鮑羅廷的離華回俄，則說：「鮑羅廷回俄。至此，孫中山確定的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等政策均被破壞，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徹底失敗了」。又說：「汪精衛集團的叛變，激起了左派人士的憤怒，鄧演達決定出走」。對於堅持「三大政策」的宋慶齡，說是「歲寒而知松柏，在滾滾的政治寒流中，宋慶齡表現了偉大的革命氣節。八月二十二日，再次發表聲明：『我深信，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』。」（頁 589-591）

孫中山有無制定「三大政策」，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。經過近年中外學者的研究，認為孫中山生前，並未提出此一特定的政策，更無此一名詞的確立，而是在他去世一年多以後，始由中共人員提出來的。如果把「膺品」視為「真貨」而肯定之，便使學術性大為減色了。

大致而言，本書大部分的論點，尚能保持客觀的態度，亦具高度的學術水平。所可惜者，一涉及「敏感」部分，即難保持客觀了。其實際情況固然可以理解，但如過分曲護，就淹沒了歷史的真象。

蔣永敬
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